

李壮鹰 主编
李春青 副主编

中世纪古文编释林

近代卷

本卷编著 陈雪虎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李壮鹰

主编

李春青

副主编

中華古文論釋林

近代卷

本卷編著 陳雪虎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古文论释林. 近代卷/李壮鹰主编;陈雪虎编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301-19164-4

I. ①中… II. ①李…②陈…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中国-近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5428 号

书 名: 中华古文论释林·近代卷

著作责任者: 李壮鹰 主编 李春青 副主编 陈雪虎 本卷编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164-4/I·236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14.25 印张 397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李壮鹰

多年以前,我们就曾经发心:在一个较宽的范围内,选取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发生过影响的一系列重要理论经典,撰成一套大型的古文论选注本。这不仅能为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学习者、研究者提供一个基础性的依据和参考,也可为当今的理论建设总结历史资源。为了实现这一夙愿,我们在2004年申请了此项研究课题。本课题有幸获得了广大学界同仁的认可和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被列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套《中华古文论释林》十卷稿本,就是这个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在书稿即付剞劂的前夕,关于本书的指导思想、学术意图和编撰体例,有几句话需要简单地说明一下。

古文论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迄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在整体水平上还存在着差距。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整个研究局面总给人一种声势有余而底气不足的感觉。研究者虽然在方法、视角上力图出新,但在理论发掘上却少有实质性的突破。不少论者醉心于“宏观”的考察、“体系”的营造,他们不肯花些工夫去深入地钻研古人的具体论著,而是浮在空中,手持瞭望筒,这儿瞄一下,那儿瞥一眼,对古文论只得到一些支离破碎、模糊朦胧的印象,便敢以金鸡擘海、气吞山河之势笔扫千年,横发议论。在他们居高临下的“视野”之下,可轻而易举地缔构出一幅幅“概貌”,继而演绎出一条条“规律”,最后总结出一套套“理论”。这些论者视物,颇有堂吉珂德骑士的特点:来自客观者少,而出于主观者多。他们的眼睛不管收纳,只管放射,故往往看朱成碧,指鹿为马,甚至于凿空为有,无事生非,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飏于静树。览其大著,构篇虽颇宏阔,发思不乏杼轴,但论述却总显得浮泛、空疏,缺乏稳固的支撑。原因何在呢?其实说起来很简单:病在不学而已。大抵治学,尤

其是治古学,对古人原典的阅读和释义,本应该是所有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我们的这些研究者却漠视甚至干脆脱离了原典,像明清实学家笔下的心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也正因为他们的研究不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而是从先入为主的某种理论出发,则所著除了以“创作”来代研究,凭想象去“画鬼魅”,别无他途,此孔子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打个比方,古文论研究好比建塔,而对原始文本的准确解读应该是这座塔的根基。可我们的有些研究,“塔”造得很高,但愈来愈觉不稳,摇摇欲坠,最后惊视脚下,才发现原因盖出于塔基之不牢:因为他们的整个研究是构建在对古人文本的误解上的。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研究中,误解原典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整个学界来讲,此种倾向作为一种学风,其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就古文论研究这个特定领域来讲,它与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了研究所应凭借的基础建设有直接关系。当然,此种状况,也与古文论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有关:古文论所由产生的古代文化背景与现代相异,古人所用的思维方式和阐述方法上与现代不同,而这些都决定了古代的理论与现代的理论话语之间不可能简单地通约。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把古人的理论文本放回历史之中去精读、把握,偏差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明清之际的学术史上,为矫正理学、心学的空疏浮泛,曾经有一次规模浩大的实学运动。学者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发扬“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从而有力地矫正了长期的学术积弊,大大深化了对古代文化的研究。现在看来,前代学者的实学路径,对深化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为了扭转古文论研究的空疏浮泛之风,为研究注入活力,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学界重新提出“回归原典”的口号。在本项目中,我们力图发扬前辈学者的实证精神,通过对古文论经典文本的仔细考索、认真解读,重新找回被我们忽略或抛弃的古人的“本来的思想”。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课题研究建立起一种理念,即恢复文本本身在古文论研究中的本体地位。也就是说,所有历史上的文论论著文本,绝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古文论研究的

“材料”，而是古文论研究之旨归。因为所谓“材料”，是可以随意取舍、砍削，用以营构别的建筑的工具。而历史文本却不然，它不能是工具，而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本身。如果说，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在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文本解读，那么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就尤其是这样。它所直接面对的，应该是古人关于文学的论著文本，整个研究不但必须以这种文本阐释作为基础，而且应该作为核心。脱离了文本，其研究必将丧失客观性、科学性，从而沦为凌空蹈虚的游戏。

应该说，在重视文本的搜集、整理方面，以往的古文论学者一直有很好的传统。因为古文论相对来讲属于比较新的学科，而我国的文论著作原本又极其零散，故上个世纪学科草创以来，古文论的研究一直伴随着对古代文学批评论著文本的整理。这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搜集，二是注释。前辈们关于古文论论著的搜集整理，为我们的项目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应该看到，以往的选注本，由于受社会形势、思想认识和文化视角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选材的范围、理论的辨析、观点的评价等方面还都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故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今天的古文论学习者和研究者的需要。我们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充分吸纳前辈的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同时也能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对当前古文论研究的空疏、浮泛之风有所匡正。

《中华古文论释林》共分十卷。第一卷：先秦两汉文论；第二卷：魏晋南北朝文论；第三卷：隋唐五代文论；第四卷：北宋文论；第五卷：南宋金元文论；第六卷：明代文论上卷；第七卷：明代文论下卷；第八卷：清代文论上卷；第九卷：清代文论下卷；第十卷：近代文论。各卷都按照时代的顺序，精选了本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文学论著文本，对各篇文本给予仔细的考订和阐释。本书选文的标准注重纯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突出建设性的理论。不过因为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始终较为宽泛，文学思想的表述也往往伴随着具体的作品的评论来进行，故这方面的著作不可能完全剔除。古人的文学观念是逐步清晰的，对文学规律的探讨也是逐步细化、渐渐深入的，这也就决定了选

文分量的分配,中古以前选材较少,中古以后选材渐多。而对评注分量的安排,正与此相反:中古以前时代较远,不少的命题和概念又属初次提出,故诠释和辨析需要多费一些笔墨;唐宋以后则诠释从简。《释林》每一卷前都设有前言,概述本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介绍文学和文论发展的脉络。每篇文本阐释都分为理论评述、文义疏证、附录文献几方面内容。理论评述一般放在选文的题注中,简要概括本文的文论思想,揭示其社会思想背景,评述其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本书的注释不止于疏通文义,而是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上,把力量集中在对理论精神和思想内涵的阐发上。对于文本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命题和概念,不是简单的今译就能谈清楚的,我们就索性铺开摊子,从文字考源、语义追溯、史实的辩证、论理的剖析等等角度进行较详的阐发,力图把隐于概念之中的深刻的思想、真实的意蕴开掘出来。这一工作,与前文所讲的过度阐释的流行病不同,它是一种必要的解剖或稀释。古文论的有些概念,好比核桃一样的果实,它外边包着坚硬的壳,要吃它,需要费些力气把它剖开,仔细地把嵌在壳里的果仁剥出来。它又像陈年丹药,因为它浓得化不开,故需要注入足够的清水来加以稀释。在这种剖剥和稀释的过程中,我们既立足于文本本身的阐发,又特别突出了注释的开放性。以往的注释,大都只强调对文本的导入,著者多将具体的文本视为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屋子,故解读和阐释只限于文本之内。而我们则把文本看成是一个窗口,它之中的每一个命题,都是时空经纬复杂关系中的交汇点,它既承接着历史,也反映着现实,又开启着未来。一句话,它连接着许许多多文本之外的东西。因此,对于解读者来说,文本既是一个特定的世界,又是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故对文本的阐释,不能只是导入,也要导出,要使注释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基此,我们在注释中,努力做到点、面结合,论、史结合,疏、证结合,文意的释诂与观点的评述结合,集注和新注结合,辑评与新评结合。注意适当运用上挂下联、触类旁通的方式,以使读者通过领略文本而获得一个立体的历史时空感。——这一点,可能算得上是我们在注释思路中对以往的突破。

考虑到我国古代文论在外在理论形态上的零散性,我们在每篇

(或每组)选文后面又选了若干有关材料作为附录,以供研究者参考。这些材料,有的是同一作者的其他论述,结合选文来读,可窥出作者的思想全貌;有的是历史前后对选文中有关问题的不同论述,可帮助读者把握某种特定理论的发展过程;还有的是后人对选文理论的评论,可帮助读者了解选文的影响和在文论史上的地位。总之,我们通过每篇附录的参考篇目,还是想为读者提供走出文本的链接途径,使人们看到部分之外的整体,零散背后的关联。

原典文本的准确可靠,是正确阐释、科学研究的前提。古代文论的文本与所有的历史典籍一样,在漫长的流布、传写过程中,有版本上的讹误、改窜甚至伪托等等问题。这些情况会严重影响对古人真正思想的把握。过去的选本在这方面多是忽略的。本课题在阐释文本时,首先以文本的考订校勘为基础。尤其对中古以前的论著,我们不仅尽量挑选善本入选,而且在文中列出重要的校记,以帮助读者对文本原义的斟酌揣摩,在审慎的比勘之中求得定谳。

本书各卷的选注工作,是由多位学者分工完成的。选文的篇目、编著的指导原则和大致体例,是经过反复协商而决定的。各卷初稿交来统一协调后又经过分别的修改润色。因每位执笔者的学术品格终有不同,故在原则体例大致相得的前提之下,也保留了每一卷的个性,相信这样做只会加强,而不会破坏全书的整体感。当然,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下的工夫还不够,全书各卷都会有疏漏、失当甚至谬误之处,诚挚地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课题研究成果,在整个研究和出版过程中都得到了部、校、院、中心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资金襄助。北京大学出版社也为本书的出版作了辛勤而细致的工作。谨此并致谢忱。

2011年4月22日

前 言

近代文论是中国近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主要时限集中在鸦片战争以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和纲常伦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万古不易之常经”。这种以家国宗族和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体系,具有凝聚性、稳定性,数千年来虽经几次大的文化输入,但始终没有突破和改变其固有结构。但是,鸦片战争一爆发,如马克思所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化,各项制度都发生剧烈变化,中国文学、文化和学术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文学观念、理论与批评也一步步地从传统过渡到现代。近代文论其实既是对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状况的反映和反思,也是对这种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参与和创造,是这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考察近代文论的出现和发展,大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或线索加以把握。

一、文教变革、报章勃兴与语文观念的变革

西方文化东渐中土,本土文化自然是既内在地抗拒,又不得不在各方面与时变化。总体上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进而到思想文化层面的痛苦的变革过程。随着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志在革新的人们从西方取来了进化论和民主、平等各项思想武器,用它批判日益僵化的传统儒学,批判旧的纲常伦理。进化论和民主、平等思想成为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为宣传民主、自由、平等服务。传统文

化越发失去原有信用,文化各领域都发生剧烈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教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各类文化设施和文化事业陆续出现,成为新兴的文化部门。文教体制的变革和现代报章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语文问题,成为近代文论转型的重要背景。

近代中国逐渐地发展起各项现代文化事业,如学校、报刊、出版机构、图书馆和文化团体等。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事业大都由外人借传教发端并受其支配。中国自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是1858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外新报》。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出版的此类报刊总共不过十余家,且影响很小。从维新运动开始,民族国家各项文化事业开始逐渐建立。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盛行,即始于戊戌维新运动时期。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先后在京、沪分别刊行《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和《强学报》,结果遭清政府取缔。1896年8月,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再创《时务报》,获得更大成功。此后,各地竞相效尤,一时兴起办报热,短短三年间新增报刊数十家,全国报刊总数较1895年增加了3倍。著名的有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报》、天津的《国闻报》等。20世纪初革命风潮兴起,海内外鼓吹革命的报刊随之激增。1900年1月孙中山在香港出版兴中会机关刊物《中国日报》,其后革命派在东京、香港、澳门、南洋、美洲和上海等地相继创办报刊120余种,著名的如《民报》、《复报》、《浙江潮》、《江苏》、《警钟日报》等。辛亥革命后,全国报刊增至500种,总销量达4200万份,盛极一时。“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全国报刊一度降至139种。据统计至1921年,又恢复到1134种(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87、153页,下册第676、711页)。中国现代文化事业稍具规模并有初步发展,这对于现代中国百年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文教体制是近现代化进程中变革最为深远的领域之一。传统文教到明清时期已开始僵化,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科举成为禁锢人心的精神枷锁。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教会学校和

教育逐渐在中国渗透,教会建立学校,编纂教科书,各类层次的学校日渐扩大。维新变法时期,清政府提出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文,兴办学校。教育体制的变革始于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等重新拟定《奏定学堂章程》,并经法令正式颁布全国施行,通常称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清末民初新式教育体制的主要依据,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1905年清廷又迫于形势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由此结束了自隋朝以来实行1300年之久的科举取士制度。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制的实行,中国在20世纪初出现了兴办学堂、编印教科书的热潮。1907年全国各类学堂总数达37888所,学生达1024988人,1908年达47995所,学生达1300739人,1909年学生达1626720人(参见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1页)。商务印书馆从1902年开始编印教科书,成为近代出版教科书最多的一家。这样,经过西来教会教育的冲击、晚清政府教育改革和民国初年教育改制,传统教育逐渐为新型现代教育所改造和取代。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整个晚清和民初文化变革的重要基石。报章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并不是简单、透明的中介物或媒质,它本身就带有信息,意味着新的信息方式和生活形态。从传统版刻到近代报章,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还牵涉到传播形式、写作技能、接受者的心态、写作者的趣味等,实在关系重大。自晚清以来,人们逐渐发觉文人著述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也不再追求“十年磨一剑”,而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近代报纸和杂志出来以后,报章文的勃兴促成文章体式、文章体用和文学观念从传统向近现代的深刻转型。1901年《清议报》第100期的《中国各报存佚表》上有一段话很有象征意味:“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报馆文讲究“文以通俗”,要求在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内普及文化,教育群众。精英文人逐步认识到过去的文章过于古雅,“文集文”不过是文人的积习。近代文化和文学的事实证明,报章出现不仅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化,传播信息也随着变形,而且,语言、文类、文

体、风格和趣味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出现了较大升降和变化。

值得注意的还有晚清“言文一致”思想的出现和白话文运动的崛起,它们对近现代以来的民族语文和文学的变革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的语文变革只是起源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但近年的研究指出,在五四之前的晚清至少存在一个白话文运动,正是由于这个先在的白话文运动直接开创了后来五四白话文学的先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其实是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在这些运动背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言文一致”思潮是中国语文和文学现代化运动的思想动力之一。首先提出“言文一致”说的是黄遵宪,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1887)中指出中国语言与文字不合,未来走向必与西方一样,也是“言文合一”。由此,方块汉字开始被判定为不如拼音文字,汉字文化渐披恶名。许多启蒙思想者对民族语文的情绪开始恶化。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未来世界的语言文字也应该“世界大同”,世界各地的人应该在“地球万音室”中制作统一的语音;谭嗣同在《仁学》中呼吁“言文合一”,因为中国语文繁难、费力、固执、荒谬,是“繁而劣”者;吴稚晖更强调中国汉字汉语既然天生“野蛮”、“低效率”,不符合于“科学世界”,所以应当采用作为“万国新语”的世界语。马建忠是语言学家,也认为中国学习语文要比西人花费更多时间,所以要像西方一样构建“文法”。清末民初的言文一致思潮和文字拼音化的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文学的走向和现代化进程。

二、传统诗文观念的衰变及其总结

有清一代所形成的诸多传统诗派、词派和文派在近代都逐渐衰落。对近代文论和诗文批评而言,在清代整理过去几千年传统而形成的相当完整的诗学,既是一份宝贵的财富,也是一种沉重的包袱。不少文论家、诗学家致力于传统,恪守家法,在艺术造微方面多有推敲和总结。也有一些人在坚持传统的同时,面对国运衰微、列强侵逼、西学东渐、风云变幻的时局,力图有所变革,有所突破,打破传统

的束缚,解放个性,并且讲求致用。但从总体上看,传统诗文观念日渐衰变,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这里以宋诗派、常州词学和桐城文派及其思想的日渐没落为代表,稍作检视。

晚清诗坛崇尚宋诗的气氛一度活跃并且与时衍变。一般认为道咸年间的宋诗运动发轫于程恩泽和祁雋藻,二人身居高位,煊赫于世,此唱彼和,宋诗运动得以展开。继程、祁之后,在咸丰、同治年间,有何绍基、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喜言宋诗。宋诗论诗标举“不俗”,表现个性,但其中浓重的士大夫式的淡泊清高,其实是强调学诗要以学问为基础。至光绪年间,沈曾植、陈三立、陈衍、郑孝胥等又一批崇尚宋诗的诗人崛起。他们互相唱和,结成一派,形成所谓“同光体”。虽然他们的政治态度、艺术风格和创作理论不尽一致,但不主唐诗,喜言宋诗,是他们的共同倾向。陈衍是他们的理论代表。后来沈曾植又进一步提出“三关”说。光、宣以降,宋诗派最大的特点也是主宋诗,而不专宗宋诗。他们吸取了前人“墨守盛唐”的反面教训,注意拓宽门径,从而能够争取广泛的响应。从总体上看,不管如何精微、圆通和丰富,宋诗派及其主张毕竟走到了古典时代的末路。

清代词坛一度打破元明的冷寂局面而中兴,扬波逐流,在清代涌现出中国词学史上最后一个高潮。到晚清,在龚自珍之后也出现了邓廷桢、蒋春霖、谭献、庄棫及“清末四大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等名家。当时,各种词话、词谱、词选等相继问世,在词学的理论总结和整理考订方面都有相当的成绩。其中谭献的《复堂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及冯煦所辑的《宋六十一名家词选》、王鹏运校刊的《四印斋所刻词》、朱祖谋编校的《彊村丛书》等都名重一时,影响较大。这些词学著作和编印大都沿着常州词派的道路,再作若干的发展或折中。此外,如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等均能不囿门户之见,时有独创之论。但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近代化进程中,词作与词论作为士人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反映和产物,其现实影响力受到很大削弱。只有当词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词学而在一定程度

上升到整个诗学或文艺研究的高度,并且注入相当的现代社会生活意蕴时,词学才会有更大的突破。而这个工作要至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发表,王氏将现代性意蕴注入词学,从而融会中西,词学方才别开生面。

清代桐城一派自方苞始创,刘大櫆继之益振,姚鼐加以确立,延续两百余年,与清朝国运相始终,造就知名文士数百余人。桐城文派总结历代文论精华,大讲文辞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往往能奠定初学写作者的规范意识和文章基础,但桐城派以文辞设教,又往往导致内容空洞,清而无物。从整体上看,近代桐城派的贡献在于整理和总结历代文章和文论精华上。在整个19世纪桐城派屡遭有识之士诟病,虽有学者起而卫道,但不免走向衰落。龚自珍、魏源等人在文学上崇尚创新,又涂着复古的色彩,对桐城古文形成很大冲击。冯桂芬、包世臣等许多学者和文人则针对桐城义法,力求文章改革。事实上,一些桐城派学者和文人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亦能注意因应形势,补充桐城文章清空之不足。方东树以卫道自居,写《汉学商兑》抨击汉学,但他也强化了桐城文派的“有物”说,强调义理气节在于适时用世,为改变世道衰蔽而建功立业。太平天国在东南一带的活动,更使桐城派的社会影响和思想基础受到猛烈冲击。从总体上看,桐城派已经无法面对现实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即将凋零。

晚清重臣曾国藩重振旗鼓,使桐城文章一度中兴。曾氏对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有很多变化和发展。比如扩大散文范围,在姚鼐“义理、考据、辞章”说之外又添上“经济”,主张借“经济”以求应当时的实用。同时他也反对理学家们“崇道贬文”,认为“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可说理耳”,文章当“扫荡旧习”,“赤地新立”。另外,曾氏对文坛上的骈散门户之见往往能采取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古文之道与骈散相通”,他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也直接选录若干赋赋。曾氏治古文而济以选学,能吸收当时文坛“骈散相通”的观点,希望古文家学习骈文,重视小学训诂、音节神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加强行文气势和文章的华彩。曾氏中兴桐城文派,在文坛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影响较大,古文辞方面尤以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和黎庶

昌声名为著,世称“曾门四弟子”。吴汝纶明确表示不宜将“义理之说施之文章”,并对西学产生兴趣,主张“救时要策,自以讲习西文为务”。他为严复的《天演论》、《原富》及多部美国日本学者的著作写序,在他主持的学堂里,特聘英文、日文教员,开设西学课程,这些都为清末思想的近代变革做出了一定贡献。吴汝纶之后,桐城派之嫡传还有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人。

桐城古文派偏于守成和总结,但对现实生活少有发明,所以随着近代文教格局的急剧变革,桐城文派在清末民初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最后竟以“谬种”的恶谥被五四一代新派学人击溃。其时有严复与林纾,早年均非桐城人,然中年都与吴汝纶交好,论文喜谈桐城遗说,一度被新文化派学人视为“桐城嫡派”。由于严、林二人在清末文坛上各有成绩,声名很大,本欲附桐城以自重,但情形却是反过来,他们以其转译西来学术和文学,给末期的桐城派带来了某些复杂而奇幻的光彩。他们引介西学译著,推广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开启了民智,又反过来加速了桐城古文的败亡。

对于桐城古文尤其是晚清桐城古文的评价,历来毁誉不一。五四时期钱玄同曾斥桐城派为“谬种”,而1920年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认为:“平心而论,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对抗,亦可谓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罪于原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阙创获,无益于社会。”梁氏评价着眼于文章人格与经世价值,褒贬参半。后人如姜书阁则认为:“平心思之,不当以其短而尽抹杀之也。即民国以来,新文学之鼓吹,恐亦非先有此通顺文章为之过渡,不易直由明末之先秦两汉而一变成功也;惟过渡太长,为不值耳。”这种观点也颇有见地。

三、经世文潮的勃兴与发展

经世化是晚清到清末民初直到五四文论的主要线索。在文化与文学上,求新求变、发愤抒情、经国济世,几乎成为近代文化压倒一切

的要求。其先声可以晚清今文经学和文论为代表。龚自珍强调“自尊”、“尊情”，欣赏感慨无伪之作。魏源著《定盦文录序》说龚自珍“以经术作政论”，“以朝政国故世情民隐为骨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也认为他“文辞倜傥连抃”，“往往引《公羊》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今文经学的用世精神到康有为已发展到极端，文化与文学已是维新改良运动的理论工具。试帖风云月露之词根本无用，经史八股也无法凑手，所以康有为认为小说就可以完全取而代之，而作为《人境庐诗草》的作者的“公度岂诗人哉”！清末民初的革命派文论，如南社等，也往往以文学为经世救国的工具。总体看来，以龚、魏、康、梁为代表的经世文论，奠定了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功利主义主旋律。

鸦片战争以来，在经世文潮中具有突出贡献的，要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改良运动。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这些维新派文人继承发展龚自珍、魏源以来的经世传统，以想象中的西方为典范，批判诗文小说与古典文化，创立了趋新求异的新文论传统。运动倡导者强调启蒙和新民，以通俗化、民间化和西方化为主要方向，要求写作摒弃僵化传统和雅正趣味，积极寻求边缘地带的文化滋养。他们往往有意识地引进和模仿西方文学的大众传媒、创作技巧乃至文学种类，从而扩大文学的范围，丰富文学的表现力。文学改良运动以梁启超提出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为代表。

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与晚清政局变化和文界脉动以及其时报章文体的勃兴，有着莫大的干系。此前王韬等先进文人的文学观已然发生变化。从投身于维新活动起，梁启超就十分推重报纸的作用，先后主持《中外纪闻》、《时务报》的笔政。1899年梁启超东渡日本，更进一步作《夏威夷游记》，鼓吹以“欧西文思”入当代文章。文界革命的最大成果在于引入大量新名词，树立了一种与报章传媒密切相关的“新文体”，风靡学界。维新变法期间晚清政府允创报馆，1902年又废八股改试策论，作惯八股文的读书人骤然失去依傍。由此梁启超的报章“新文体”甚至成为应考者的枕中之秘。半文不白的“新文体”推行开来，有力地推动后来五四时期的文学白话化运动。

梁启超又大倡“诗界革命”。他认为,只要“新意境”、“新语句”和“古风格”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他称赞黄遵宪的诗开拓了“新意境”,为“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在1902年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中,梁氏又鼓吹诗歌创作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影响很大。梁所提倡的“新意境”主要指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和新知识,也包括运用这些新诗料及新视角所产生的诗歌新境界。诗界革命影响下的诗作往往有启蒙开化之功,诗歌创作重新贴近现实生活。以流俗语入诗,对民歌、弹词、粤讴等通俗文艺形式的借用,也都体现出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思想情感内容与语言文体形式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古典诗歌向现代白话诗的革命性激变打下了基础。

“小说界革命”的提法,至梁启超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才正式出现。其实戊戌变法前后,出于政治改良的需要,受到域外文学的启发,维新人士即已对传统小说题材和形式感到不满,开始关注小说革新的问题。1902年梁启超撰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着重论证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因此该文被视为革命宣言书。他提出小说“改良群治论”,认为“小说为国民之魂”,是“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观点影响巨大。晚清小说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观点。由此在20世纪,小说地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某种“大说”或“史诗”,超过一直属于正统中心文类的诗文。小说地位的空前迅速提高,最终导致传统小说观念的崩溃和近代文学观念的迅速变迁。

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振聋发聩,促成了一场真正的小说革命。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小说和翻译与创作形成热潮。传统章回小说的解体,晚清小说批评和理论研究也相应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比较知名的小说评论家如夏曾佑、狄葆贤、陶佑曾等,小说家兼评论家如林纾、吴趼人、徐念慈、黄小配等。随着小说地位和影响因现代报刊出版业的迅速发展而提高与扩大,写小说赚稿费也成为可以谋生的手段,第一批以小说创作或翻译为职业的专业小说家产生,这也标志着近现代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出现。